

战国政区地理

后晓荣 著

 文物出版社

战国政区地理

后晓荣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编辑 李 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国政区地理 / 后晓荣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010 - 3511 - 3

I. ①战… II. ①后… III. ①行政区划 - 历史地理 -
研究 - 中国 - 战国时代 IV. ①K928. 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0872 号

战 国 政 区 地 理

后晓荣 著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850 × 1168 1/32 印张: 9.75 插页: 7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511 - 3 定价: 42.00 元

首都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编委会

顾 问

齐世荣 宁 可

主 任

郝春文

委 员

(姓名以汉语拼音为序)

迟云飞 何 平

李华瑞 梁占军

宋 杰 徐 蓝

叶小兵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章 战国政区地理研究简史	(17)
----------------------	--------

第一节 文献集撰期	(18)
-----------------	--------

第二节 乾嘉考据期	(21)
-----------------	--------

第三节 考古研究期	(25)
-----------------	--------

第二章 韩国政区地理	(33)
------------------	--------

第一节 韩国简史	(33)
----------------	--------

第二节 韩国置郡	(35)
----------------	--------

第三节 韩国置县	(37)
----------------	--------

附 (两周地理)	(59)
------------------	--------

第三章 魏国政区地理	(63)
第一节 魏国简史	(63)
第二节 魏国置郡	(67)
第三节 魏国置县	(70)
 第四章 赵国政区地理	(104)
第一节 赵国简史	(104)
第二节 赵国置郡	(108)
第三节 赵国置县	(114)
 第五章 楚国政区地理	(146)
第一节 楚国简史	(146)
第二节 楚国置郡	(151)
第三节 楚国置县	(155)
 第六章 齐国政区地理	(184)
第一节 齐国简史	(184)
第二节 齐国置郡	(187)
第三节 齐国置县	(191)

第七章 燕国政区地理	(207)
第一节 燕国简史	(207)
第二节 燕国置郡	(210)
第三节 燕国置都	(212)
 第八章 秦国政区地理（战国）	(223)
第一节 秦国简史	(223)
第二节 秦国置郡	(226)
第三节 秦国置县	(231)
 结语	(285)
 附表	(294)
 参考文献	(297)
 后记	(302)

绪 论

一 战国政区地理研究的意义

行政区域是国家为有效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区域，也是相应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简称政区。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再分配”的一种主要形式，是国家统治集团意志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习俗等各种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客观反映^①。行政区划作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行政手段之一，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行政区划一般具有地域性和不重复性，以及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对于同一个国家来说，今天的行政区划是在过去的基础上逐步演变而来的，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前代的行政区划，完全脱离原有的基础开创全新的行政区划并不多见。事实上，后一代行政区划的很多创新也正是萌芽于前代的行政区划之中。如始于东周时期的县制，作为一级基本行政区划单位，历经 3000 多年，一直沿用至今，有许多地方甚至连县名、县城和县城范围也没有多大变化。

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战国时期是地方行政区划的大变革阶

^① 靳尔刚、张文范：《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中国出版社，1996 年，第 4 页。

段。特别是从春秋开始，各诸侯国在相互征战血和火的洗礼中，逐步认识到分封制的弊端。为了打破封邦建国旧制度的束缚，确立国君的集权统治地位，同时也为了有效地管理好战争中新开拓的疆土和满足军事上抗御邻国的需要，各国相继在新开拓的疆土或边远地区废除分封制，而由诸侯国君任命官吏管辖一定的区域。地方行政管理体制逐步由贵族世袭制过渡到官僚制。地方官吏由国君直接任免，只领起俸禄而不享有封地、采邑。地方重要事项都必须报奏国君，地方官吏无权擅自处理，从而打破了贵族世袭制下的血缘联系，排除了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世袭把持。这种第一次对人民的管理主要按地域而不是按氏族成分划分，真正有了现实意义的行政区划，实现了中国行政区划史上一次质的飞跃^①。到战国时各国都较为普遍实行县制和部分郡制，实际就是秦汉郡县制的先声。由于先秦文献典籍的缺载，有关战国各国所设置郡和县的相关具体内容今人无从知晓，只有部分内容在《史记》、《汉书》等传统文献中有所反映。历代学者都试图探讨战国时期的政区地理问题，但因文献的缺失，至今没有一个较为满意的答案。事实上，文献中有关战国行政区划的内容相当简略，仅靠文献研究无法较全面的反映战国行政区划的变化沿革。

古籍文献关于战国历史地理记载的有限性，自然也就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有关战国时期的许多历史地理问题无法从传统文献中得到回答。甚至同一问题，不同学者利用不同文献得到的结果也大相径庭。有关战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突破，唯有新材料出现和新文献的增加，即王国维先生所谓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②，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来自地下发掘出土的考古材料。

① 浦善新：《先秦行政区划钩沉》，《中国地名》，1999年第6期。

②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先生全集》（第五册），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

20 世纪初,近代考古学引入中国,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和新成就极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向。各种考古遗物和遗迹都为历史研究提供鲜活的原始资料,特别是中国考古遗物中,大量时代明确,有文字遗存的文物出土和古代城址考古的确认等,都为研究历史地理问题,提供新鲜的“血液”和第一手资料。目前,随着田野考古学的发展和考古资料的累积,历史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对这些不同年代的考古资料从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成果相当多。如甲骨文和金文的出现,极大丰富了人们对先秦时期的地理认识。事实上,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也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意识中,利用考古资料探讨了某个时代的地理问题,如李学勤的《殷代地理简论》^①,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②等就是代表。在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时,众多的历史地理学家也注意到考古研究和考古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性。人们普遍认为考古资料是历史地理研究最好的佐证。特别是在缺乏文字记载的上古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中,考古资料的作用显然是传统文献资料无法比较的。侯仁之就说过:“文物考古工作在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过程方面,也同样可以做出积极的贡献”;“更有普遍意义的是,考古工作者根据遗迹文物的鉴定所判断的绝对年代的尺度,对于历史地理工作者在测定地表过程的速度方面,是很有参考价值的”^③。日本学者小牧实繁在《考古地理学》中论述遗迹地理学(即考古地理学)时也指出考古学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不仅史前时期,包括历史时期在内,都可以依靠遗迹、遗物,通过考古学的方法,开辟新的道路”。

① 李学勤:《殷代地理学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③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文物考古工作》,《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作为历史考古时期的战国考古，大量出土的考古资料也极大丰富了人们对战国历史文化的认识。特别是此期丰富的有文字遗存的文物，更是为此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文献材料。如考古出土的各种先秦货币、兵器铭文、战国地图、战国古城址等就是我们研究战国历史地理的线索。正如陈寅恪先生在论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其治学方法时说：“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①事实上，今天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较大成就，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就给了历史地理学以很大的帮助，其中考古学的成就作用最大。如多年来，一系列古城、居民点、宫殿、寺庙、仓库、墓葬、道路等遗址的发掘和整理，使人们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标，有的证实了史料的正确性，有的纠正了记载的错误，有的改变了后人的误解。正是有了这些坐标，人们还可以对相关其他地点的位置作出合理的调整和推断，所以考古发现成果的作用比其他传统文献所不能替代的，其往往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战国考古中，出土有文字遗存的文物特点是出土量大、品种多，历史信息含量丰富。其品种所涉及铜器、兵器、玺印、封泥、石刻、简牍、陶文、砖瓦文、漆器文、木板地图等，几乎包含了战国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些有文字遗存的战国文物，其内容涉及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其中以职官、地理的相关内容尤为突出。这些“地下文献”的内容对增订、校补战国时期的职官、地理等意义尤显突出。

由于学科的分割，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差异性，以及考古资料的分散性等客观原因，历史地理学者在研究各代行政区域地理时，真正综合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历史地理的现象，并不多见。事实上，众多的考古文物资料中，涉及各代行政区域地理的

①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资料相当丰富，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如果将上述战国时各种考古文物中的地理资料综合利用，对我们了解战国时期各国郡县设置有关的行政区划发展就有十分现实的意义。特别是在传世文献无法解决秦以及战国，乃至先秦历史地理的问题时，考古资料就更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些新材料的出现和综合利用，必将促使我们对战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战国政区地理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尚未有从考古文物资料出发，对战国政区地理这方面的综合研究。

正是本着以上所论述学科研究意义和学术空白的结果，本书拟从战国考古文物出土的资料，特别是其中涉及到战国历史地理的材料出发，以《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水经注》等涉及战国历史地理文献为基础，运用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文物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科学方法和研究成果，对战国历史地理材料进行系统梳理、整理、研究。其中，重新审视战国历史地理，特别是各国政区地理中的重大问题，解决一些传统文献无法解决的此时段历史地理的基础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战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

二 资料的搜集与运用

研究历史时期的政区地理，复原各时期的政区地理面貌，也正如研究历史、科学史一样需要搜集和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的第一手资料。即“历史地理学家必须研究原始史料，而不是局限于引证历史研究的现代著作。因此，文献工作是这个专业的专家的基本工作形式之一”^①。我国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它们

①（俄国）B. C. 热库林、韩光辉译：《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历史地理的直接资料和间接信息。但是具体到某一段历史时期的历史地理资料就不一定全面,尤其有关我国先秦时期的地理资料记录残缺不全,支离破碎,给该阶段的历史地理研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侯仁之就提到研究历史地理“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学的训练,熟悉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并能运用一定的历史方法”^①。显然,在依靠传统文献不能解决战国历史地理学科研究的情况下,这就需要人们从其他角度来思考其解决的办法,特别是考古学的介入,其所获得大量的“地下文献”(主要是带有文字资料的文物和城址考古),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可能。本书探究考证战国政区地理问题,所利用的材料主要是考古出土各类战国考古文物资料,这就要求首先要完成考古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合理的利用。从目前情况看,进行战国政区地理研究可资利用的考古文物资料大致有以下几类:

陶文 古陶文指古代在陶、砖瓦等器上刻、划、戳印等文字,是研究古文字、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宋人最早进行陶文著录,清人成就较大者当属清末学者陈介祺。他最早从山东出土的陶文“陈□”中识别出为战国齐国陈氏之族,从此开陶文研究之先河^②。之后罗振玉、潘祖荫等都寻求著录。陶文的发现地也由最初的齐鲁地扩大到河北易县等地。建国以后,河南郑州、洛阳、登封、新郑、新乡、荥阳、温县,山西夏县、翼县、侯马,山东临淄、邹县,陕西岐山、扶风、凤翔、淳化、渭南、咸阳、西安、临潼,河北易县、藁城、武安等地,均考古出土了战国陶文。其内容特点很多是刻在砖瓦上,或戳印陶器之上,陶文罕见长篇铭文,多数是只有二三字或三四字,但是综合起来看,

①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② 李学勤:《山东陶文的发现与著录》,《齐鲁学刊》,1982年第5期。

内容却丰富多彩。这些陶文资料皆经科学发掘，出土地点和时代比较清楚，用来考查以前非经科学发掘所得的陶文，判别其时代，无疑也提高了后者的史料价值。事实上，陶文出土的具体地点，对研究古史也至关重要。无论是考查古代城址，还是历史地理研究，都可从中得到重要的线索或启示。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利用陶文资料研究古史成绩日益显著，许多学者撰写了不少重要文章和著作。值得一提的是高明编著《古陶文汇编》基本上总括了 20 世纪 80 年代及之前所见传世和出土陶文，为一集大成者^①。全书按时代与地区分为十目，其中涉及战国陶文资料最多，分布广，共有七目：山东地区、河北地区、陕西地区、河南地区、山西地区、湖北地区、出土地点待考者。经此整理，大大方便了人们对古陶文史料的应用。

金文 战国时期青铜铭文的格式、体例、以及刻铸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战国中期后，铭刻内容大多转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上。同时，作为金文的载体，也不再是钟鼎等礼器，而更多以兵器、钱币等日常生活用器为主。其中此期较多的金文内容涉及到战国时的地理问题，是研究此期历史地理问题很好的资料。

比如，三晋兵器铭文中时常有“某某 令”或“某某库”格式的字样，其中“某某”为地名，“令”就是该地的县令。战国时期各国在县邑设置各种武库的制度，并一直延续至秦汉时，比如西汉晚期的尹湾汉简中武库及兵车器集簿等内容^②。因此，战国兵器中大凡有“左（右）、上（下）库”等铭文者，可知其为县邑所在地。从这些文物资料出发，我们可了解不少三晋地区置县的确切例证。据各种不同材料统计，战国时期的兵器铭文涉

① 高明编著：《古陶文汇编》，中华书局，1990 年。简称《陶汇》，文中直接注出。

②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 年版。

及不同地名近一百多条。其中三晋（韩赵魏）的地名就有近 60 条^①。结合文献资料，这些兵器上的地名铭文大部分可确证为战国时各国置县，即县级单位，其中较多都为秦代置县所继承，同时也将《汉志》中众多传统上认为西汉开始设置的属县时间提前到战国。

战国铜器铭文著录和研究较早。宋代吕大临《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就分别著录秦景公所铸钟和秦平阳斤权。其中平阳斤权就表明此物为秦平阳县之物，侧证秦设置平阳县。战国时期，较多铜器铭文也涉及各国的地名。如魏安邑下官钟（《集成》9703）^②、内黄鼎（《集成》2308）等。据学者考证，三晋铜器中“上官”、“下官”食器所置用的城邑或为国都、或为重镇，均应为县邑所在之地^③。事实说明，战国中期以后的秦铜器铭文更是以量器和兵器为主^④，内容多涉及秦国历史地理。如高奴禾石权，其铭文就涉及秦上郡属县高奴。秦兵器有中央和地方制造的兵器，其中地方制造兵器的监造者多为郡之行政长官，如“廿六年蜀守武戈、二年上郡守冰戈”等，就为讨论秦郡县的设置提供了佐证。特别是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⑤一书基本上收录、考证了 20 世纪所见秦铜器制作的相对年代，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战国时期秦国郡县设置的相对年代提供了可能。

钱币铭文 战国时经济发达，各国均铸造了各自的金属货

-
- ① 吴良宝：《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
 -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7 年。简称《集成》，文中直接注出。
 - ③ 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及相关制度问题》，《古文字研究》（第 17 辑），中华书局，1989 年版。
 - ④ 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等著：《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 年，第 330 页。
 - ⑤ 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新文丰公司发行，2000 年。简称《编年》，文中直接注出。

币。这些货币的形制、时间、流通范围各不相同。特别是钱币绝大多数都铸有铭文，记币值或铸造城邑，其中以表城邑地名为主。有些带地名的钱币甚至出现在春秋时期，说明春秋时期商品货币经济刚刚萌芽的城邑和聚落的出现，到战国中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基本上都成为各国所辖新兴的郡县城市。因此这些货币上的城邑地名也为我们判别战国时各国置县提供很好的材料。如新发现的三孔布“屯氏”经黄盛璋先生破释，不仅知晓战国时期赵国曾经设置了屯氏县，同时掘示了不知地望的两千年前屯氏河的变迁^①。据黄锡全不完全统计，先秦金属货币涉及的地名“共计约有400种左右（包括一地而见诸不同的品类），其实还要多”^②。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各国钱币中地名铭文有相当部分也见于战国兵器铭文，特别是见于县令监造的兵器铭文中。二者互证，说明战国中晚期各国（主要是三晋各国）的货币铸造还是由县邑来执行，反过来也说明战国钱币上地名铭文都已经设县^③。正如陈隆文在讨论先秦货币地名与历史地理研究的关系时说：“战国之际，诸侯争霸兼并，疆域变革而剧烈，朝夕替改，如能充分利用先秦货币地名资料进行各国政治疆域的研究，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上述缺陷。”^④事实上，战国钱币中所涉及历史地理方面的铭文也是探讨战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玺印、封泥 玺印即印章，上刻印文，有公、私印之分。封泥即中国古代封检简牍或其他物品，并加盖印章的泥块，实际上

① 黄盛璋：《新发现的屯氏三孔布与相关问题发覆》，《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

② 黄锡全：《先秦货币中的地名》，《九州》（第4期），商务印书馆，2001年。文中所引用钱币都出自此文，不再一一注出。

③ 吴良宝：《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④ 陈隆文：《先秦货币与历史地理研究》，《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

是古代玺印使用之后留下的遗痕。春秋之际，封泥随着中国古玺产生而产生，盛行于秦汉、魏晋，至唐以后消失。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古玺和封泥与丰富的史实紧密相连。特别是大量的公印和它们的遗痕——封泥具有补史、纠史、证史的功能。故周晓陆先生说：“许多玺印文字有等同于文献的重要作用是毫不夸张的。”^①

古玺的研究和利用由来已久，其存世量也非常之多，仅就春秋战国玺印而言，目前见于著录的共有 6000 多方^②。较早整理者有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③，收录了不少散见各印谱和公私收藏的古玺资料。除传世著录品之外，近五十多年的考古墓葬、窖藏和遗址都出土了数量不少春秋战国古玺。由于各国经济、文化的差异，此期的古玺有明显的分域特征，因此有学者称此期玺印为“蓬勃期”^④。周晓陆等就认为本期玺印可分为 6 区：北部区以燕国玺印为代表、东部区以齐国玺印为代表、中部区以三晋玺印为代表、南部区以楚国玺印为代表、西部区以秦国玺印为代表、西南区以巴蜀玺印为代表（巴蜀玺印为巴蜀文字与图像印，目前释读尚困难，不在讨论范围）^⑤。各区玺印不仅印体面形不同，文字内容也明显表现不同的差异。随着战国文字研究的深入，人们基本上可以了解战国时各国文字之间的差别，对判别战国古玺的国别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

① 周晓陆编著：《古代玺印》，中国书店，1998 年，第 1 页。

② 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73 页。

③ 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 年。之后简称《玺汇》，并直接在文中注出。

④ 周晓陆编著：《古代玺印》，中国书店，1998 年，第 135 页。

后晓荣等著：《中国玺印真伪鉴别》，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第 30 页。

⑤ 周晓陆编著：《古代玺印》，中国书店，1998 年，第 151～160 页。